

「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學術研討會論文

明清帝國的空間

汪榮祖

台北東吳大學 南投暨南大學 主辦

2007年10月27-30日

未刊稿請勿引用

明清帝國的空間

汪榮祖

引言

「地理決定論」(geographical determinism)宣稱歷史完全是地理環境的產物，固然言過其實，也不為多數史學家所能苟同。然而，史家卻不能不考慮到地理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事實上，任何一群人，生存在特定的空間裡，勢必要受制於其所處的自然環境¹，例如氣候對人文的影響，就至深且巨²。中華帝國自秦漢到明清，在特定的一個地理環境之中，綿延二千一百餘年，呈現出來的不僅是時間的承續與朝代的興衰存亡，而且是空間的自然條件對歷史發展、心態、佈局與策略上的影響，以及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制約。中華帝國發展到明清，領土不斷地擴大，形同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但形同而情實異。

西方帝國的擴張雖未必是精心籌畫，哥倫布因為觸礁擱淺，始建立西班牙帝國第一個海外城市納維達(Navidad)，此事純屬意外。不過，最常見的是由於經濟利益與商業擴張之需。例如羅馬人之所以征服埃及出於對穀物的需求，英國在加勒比海的擴張，則由於想要獲致急需的糖，大英帝國的英國文明隨貿易而興隆；跟隨商業的擴張，往往不需藉助武力就能擴張到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則視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獨佔階段」。總之，西

¹ 參閱Edward Whiting Fox, *History in Geographic Perspective, the Other France*, (New York: Norton, 1971), p. 23.

² 參閱Brian Fagan, *The Little Ice Age, How Climate Made History, 1300-185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此書述及不可預測的氣候變化對近代歐洲歷史事件的重大影響。

方帝國主義，尤其在近代，擴張領土的目的主要是經由政治控制獲取經濟利益。奪取海外殖民地的動機要不在移民，而在掌控殖民地的人民與資源、市場與大量廉價勞力。其結果是少數帝國主義白人宰制殖民地上多數的有色民族。

中華帝國在歷史上不斷受到邊疆少數民族的騷擾與威脅，領土的擴張是為了保障安全，幾無經濟利益可言，甚至為達到安全的目的不惜勞民傷財，耗損國力，漢武帝屢征匈奴通西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的邊疆，尤其是北疆，沒有天然的屏障，擅於騎射的異族雖然在政治與文化上居於劣勢，但在綿亙萬里的邊界上可以乘機隨處突入，使中華帝國防不勝防，疲於奔命，若不能主動出擊，搗其巢穴，只好退而羈縻，建牆防守。秦建長城，千餘年後明又重修邊牆，足見帝國為了安全而不惜人力與物力之一般。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後建立中華帝國者，前有蒙元，後有滿清。滿蒙雖在漢族眼中是異族，但是所謂蒙古與滿州征服中國、建立蒙元與滿清兩大帝國，絕不似近代英、法、德、日諸國，以本土為帝國的核心，向外擴張，以征服之地為殖民地或屬土，而是入主中原，以中原為帝國的核心，以中國為其帝國之重，並自稱中國。

蒙元帝國之初，雖極力想保住蒙古認同，但仍不免成為另一個中華帝國，取漢名大元，並取中華廟號。蒙元在實際需要下，終於建立了以傳統中國為依據的政治體系，恢復科舉考試，進入禮樂典章的漢文化世界³。元末動亂也成為中國境內改朝換代的戰爭，如平亂者非盡蒙古人，如汝寧李思齊、福建陳友定、東莞何真，都是忠於元朝的漢將。陳友定被俘後寧死不降，受炮烙重刑而死，為元朝殉了節⁴。滿人

³蕭啟慶2002〈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載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188。

⁴錢謙益1982《國初群雄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295。

比蒙古人更加中國，入關後在禮俗上有重大的改變⁵，滿清皇朝基本上承繼了明朝的制度，清帝一如漢帝之崇尚中國文化，自小研經讀史，書法流暢端莊，定時前往曲阜朝聖，推廣儒家教育，大量刻印經典。滿清帝國足以代表中華帝國，比諸漢人政權，毫無遜色⁶。事實上，清朝開創了一個和平繁榮的「中國盛世」(Sinica Pax)。固然歷代沒有一個朝代以中國為國號，但自漢至清莫不泛稱中國，以中國自居。中國一詞原指中原，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對稱。然而由於中原不斷向邊陲擴散，邊陲也不斷向中原匯聚，中國的範圍也就與日俱增，其意義幾同天下。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少數民族還是漢族多數政權，都以中國自居，漢皇朝的劉邦所繼承的帝王之業，就是「統天下，理中國」⁷。滿清道光朝黃爵滋上〈禁煙議〉一疏中也說：「蓋自鴉片流入中國」云云⁸，可以概見。所以，所謂中國不僅具有政治上與文化上的含意，也是對此一特定江山的認知，康有為所謂「神州萬里風泱泱，崑崙東南海為疆；岳嶺回環江河長，中開天府萬寶藏；地兼三帶寒暑藏，以花為國絲為裳；百品雜陳飲饌良，地大物博冠萬方」⁹，即以簡短的詩句道出其來有自的「中國空間」。

空間的開拓

近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出現以及輿圖繪製技術之發達，才有明確的國界，或列國之間的疆域。政治國界因有關主權，必須劃得一清二楚。然而在傳統帝國時代，帝國之疆域乃兵力與國威之

⁵ 鄭天挺1980: 73,79

⁶ Ho Ping-ti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 (1967), pp. 192-193.

⁷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1975)冊7頁2112。

⁸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1977)冊38頁11587-11588。

⁹ 康有為〈愛國短歌行〉《康南海先生詩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卷1頁14—15。

所至，或民族與文化融合之所至，並無劃清疆界的必要；數千年的中華帝國以天下自居，中華之天下乃中華文化之所被，文化認同甚至超過種性，即章太炎所謂中華民族屬於「歷史民族」¹⁰，以致於到近代形成一個多民族的中國，漢族雖然一直佔大多數，但中華民族並不同漢族。而且居極大多數的漢人已雜有他族的血液，而他族也大都已經漢化。

中華帝國自秦漢以降發展到明清，種族與文化已經多次征服與融合，已經成為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統一體。清帝國由滿族所建，入主中國，為了鞏固基業，大步向西邁進，征服蒙古，收新疆入版圖，勢力直達中亞，擴大了中華帝國的疆域。事實上，朱明於十四世紀推翻龐大的蒙元帝國之後的勢力範圍已經不小，不僅收復了兩宋所失去的燕、雲、甘、隴，而且兵威伸入塞外。不過，蒙元退回蒙古本土之後，主力猶存，明成祖永樂又五度遠征沙漠，雖成功地擊敗蒙軍，但由於糧草不濟，難以深入，終不能徹底殲滅敵人，不僅不可能完全承繼蒙元帝國的廣袤空間，而且來自北方的威脅始終未解，只好採取防禦措施，著力修建居庸關至山海關的關隘，憑藉燕山而建城設防。到十六世紀後期，北邊威脅日增，始大規模重建從山海關到嘉裕關的長城防線。明代長城約12,000餘里，北經京師一段，依山興建，氣勢宏偉，沿線共築九個邊防重鎮，東起鴨綠江邊的遼東，經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西至甘肅，號稱「九邊」。

明初國力猶盛，沿長城內外而設的九邊，並非國界，而是漢蒙兩族南北對峙的防線。永樂皇帝駕崩之後，不再耗資遠征，但當時蒙族沒有雄主，草原分裂，難有作為，而明廷分化其部落，並開馬市以為

¹⁰有關章太炎「歷史民族」的分析參閱Young-tsu Wong,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7-28.

羈縻，故北疆尚稱安寧。然至十五世紀初葉，明宣德皇帝以後，蒙古出了新一代的強人也先，攻打並收編附從明廷的蒙族，騷擾邊城，勢力又漸漸向南擴張。當也先攻打大同時，明英宗輕聽宦官王振之言，於1449年率大軍御駕親征，結果冒進遇伏，王振戰死，英宗在土木堡被俘¹¹。也先挾英宗兵臨北京城下，要求迎駕，幸能臣于謙處置得宜，死守挫敵；也先屢戰不利，又聞勤王之師將至，遂大掠而歸。

土木之變後，明廷易攻為守以防堵北方的蒙古人，開始築城，於成化十年修成自清水營到花馬池長達1,170里的邊牆，沿邊分佈數以百計的城、堡、墩、臺，後又於十六世紀的三十年代重新修築了三百餘里的花馬池邊牆，完成了自寧夏向東經鹽池、定邊、靖邊、橫山、榆林、神木、到河曲的一段長城。到嘉靖中葉又先後動工三次，一共修築了1,930餘里，完成從山西西北黃河東岸起，經過大同、宣府、到居庸關的一條「外邊」，以及西由偏頭向東經寧武、雁門、平型、龍泉、倒馬、紫荊等關口，到達居庸關的一條「內邊」。直到萬曆初年，仍在修牆，然由於滿族的崛起，所築多在東邊。遼東方面的邊牆始自正統年間，先「編木為柵」，再「易以版築」，至嘉靖時完工，由山海關向北到廣寧，再南下跨遼河向東北而去，再經遼陽、瀋陽、鐵嶺的外圍，北抵開原，再自撫順往東南，經今安東鳳城而抵達鴨綠江邊。西邊的長城較小，平均高度只有15英尺，但靠近東邊500英里的城牆平均大約有35英尺之高，20英尺寬，每半英里就建有瞭望台¹²。

明代新建長城主要為了防守，蜿蜒萬里的邊牆像一條境內的馬其諾式的軍事防線，防線也不時隨著雙方實力的消長而移動。蒙古人曾入居河套，明人也曾在邊外設立衛所。明朝實力式微後，不得不改變

¹¹ 參閱Frederic W. Mote,

¹² 此段敘事主要參考夏德儀，「明代的長城」，《國立台灣大學十週年校慶專刊》，（一九五六年三月），頁63-64。

早年以九邊為易攻為守的戰略，而以邊牆作退守之計。不過，長城南北並不僅僅是對峙，雙方也多有來往與交流，實際上仍然在延續秦漢以來夷夏衝突與融合的歷史，漢蒙兩族在對邊各有幾十萬的居民，漢人移往蒙古務農從商者尤多。漢蒙間的通商無論官府或民間早有歷史成例，而雙方也有互補的商品，如蒙古的馬匹與漢人的糧食與織物都是對方亟需的；然而，明廷缺少具有遠見的政治家，未能充分利用通商貿易來消彌在邊疆上的對峙與衝突。

明朝曾積極經營東北邊疆，洪武時已經固定遼東守衛，永樂元年（1403）松花江流域內附，設立建州等衛，永樂七年（1409）又設奴兒干都司於黑龍江¹³，但國勢漸衰後，不僅未能開拓，反而退縮，然晚明猶保有遼東。朝鮮則為藩屬，洪武二年冊封為高麗王，於明始終忠順，明亦對朝鮮特別禮遇。明朝的西疆則到達黃土高原上的甘肅，開國君主朱洪武以及他的兒子朱棣曾不斷再向大西北招撫納貢，建衛冊封，特別想經營哈密，欲其「統領諸蕃，為西陲屏障」¹⁴。不過，當蒙古勢力強盛的時候，哈密就成為蒙古的附庸，明朝的西北範圍實力只能及於肅州，退守嘉裕關。西疆自青海、西康南達西馬拉雅山麓以及緬甸與雲南之西，在西藏分設烏思藏都司與朵甘都司，與印度結鄰，藏族是中國西南最主要的少數民族，居住在西藏北邊與東邊的藏族，史稱羌人。西藏與唐朝關係最密，與蒙古也親近，與明朝的政治關係雖然冷淡，文化上的影響並未中斷。

四川西南土司也相繼歸附，雲南在元代已經是行省，洪武十五年置承宣布政司使，設孟養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孟良府、車裏宣慰司、臨安府、廣南府。明代之雲南包括湄公河北岸之地，今緬甸中

¹³ 見《明會典》卷109。

¹⁴ 見《明史》，卷329，冊 頁。

部，寮、泰北部均在境內¹⁵。明初於貴州設宣慰司，永樂十一年（1413）後漸漸開發建置，於十五世紀初建省。雲貴之外，明朝的南邊諸省廣東、廣西、以及兩湖與四川，當時還較落後，少數民族人口仍然很多，由其本族人管理，史稱土司。明代計有800個軍政土司，650個民政土司，直到民國時代才完全消失¹⁶。此外安南曾於1406至1427設交趾布政司，琉球進貢稱藩，不過明代的邊疆政策原在羈縻，實際上並不能掌控部落的內部事務，故亦叛服無常。

明代的海疆蜿蜒四千英哩，雖泰半不利於航行，然遼東與山東兩半島沿岸以及杭州灣以南到越南邊境，頗多良港與深水灣。長江以及黃淮三大河流的出海口，經久泥沙淤集淺海，不斷產生新生地，濱海城鎮成為內陸，交通改道等現象。中國擁有綿長可資航行的海岸線以及眾多的海港，不可能不是一個海權國，故自唐宋以來，中國於船舶建造，海運與港口設施，以及航海技巧都佔世界領先地位。隋代已能建造長20.22米，寬2.82米，載重23噸的雙體海船¹⁷。唐代造船技術有所突破，泉州所造福船，長18丈、寬4丈2，高4丈5，可載20,000到40,000石貨物，為世界最早的尖底深水龍骨船，使唐代輪舟馳騁海上，遠揚波斯灣¹⁸。由於海上貿易繁盛，唐廷在廣州設立市舶司，由廣州通往各地。宋元時期航海知識與技術更有進一步的發展，諸如船舵的改良、水密艙的使用、防搖設施、航行工具的創新，遠洋船隻體積也更加龐大。明初航海事業繼續輝煌，仍然舉世無匹，遠航至朝鮮、日本、菲律賓、南洋各地，來自阿拉伯以及波斯等國的外國船隻也雲集閩粵港口，泉州尤著名於世，私家海商也擁有海船，鄭和七下西

¹⁵ 參閱王恢，《中國歷史地理》下冊（台北：學生書店，1978）頁1153-1154。

¹⁶ 土司數目根據龔音？，《中國土司制度》，（昆明，1992），pp. 57-63.

¹⁷ 山東平度新河鄉於1975年出土此船殘骸，見王冠倬《中國古船圖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93-94。

¹⁸ 參閱穆根來等譯《中國印度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洋，尤稱盛舉，所乘一號寶船載重估計超過7,000噸，與哥倫布的坐船相比，真大巫與小巫之比。但明於開國之初，即有丞相胡維庸勾結日本之大獄，故不時以海禁換取安定。然而海商利益之所在，情願冒險，因而禁不勝禁，反而引發走私與海盜猖獗。十六世紀的倭寇大亂，東南沿海烽火處處，明廷雖盡全力平亂，但終明之世，終採守勢以衛海疆，多少約制了海洋事業的開拓，鄭和的壯舉並無後續的發展，成為曇花一現的偶然¹⁹。

明帝國實際掌控的領土，固不能與後來的清帝國相比，然就其勢力範圍而言，東至日本海，北入沙漠，西接中亞、印度，南臨南海，疆域已甚遼闊。漢族所居的中原，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包括南直隸（明廷北遷後改稱直隸，含江蘇、安徽）、北直隸（北遷前稱北平，含今之河北與察哈爾、熱河一部分）、浙江、江西、湖廣（湖北與湖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今陝西與甘肅）、福建、廣東、四川，以及雲南，府以百計，州縣以千計，幅員堪稱廣大，人口於明初已達6,500餘萬²⁰。當義大利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於十六世紀來到中國，由澳門到廣州，北上南京，再入居北京，直到去世。他在中國感受最深刻之一就是版圖之大；據其估算，涵蓋的範圍從北緯42度延伸到19度，從東經112度延伸到132度，認為此一疆域已經超過當時世界上所有其餘王國的總和²¹。

滿清龍興於遼東邊牆之外，原是女真族居住之地。明朝開國之初招撫而後建置衛所，成祖朱棣所建衛所受遼東都指揮使節制，從西面的俄鄂嫩河到東面的日本海，設衛百餘所。永樂九年（1411），衛所

¹⁹ 參閱王冠倬《中國古船圖錄》頁98,142-152,263-264。《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圖袋（台北：學生書局）。

²⁰ 參閱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0.

²¹ 《利瑪竇中國札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7。

更設立到黑龍江的支流，勢力範圍包括了廣大的東北地區。一直要到十七世紀女真崛起之後，改稱滿州，才取代蒙古成為明朝北方的威脅，最後併吞漢蒙，建立了橫跨中亞與東亞的滿清帝國。

滿族原是明朝附庸，號稱建州，至努爾哈赤始有異圖，建立八旗，意欲建邦興國，並取代明朝為中國的共主。皇太極更積極集中權力，經營遼東，屢敗明軍，雖未於其生前入關，其皇弟多爾袞以攝政王輔助幼帝順治，推翻了明朝，建立統治全中國的新政權。順治早崩，康熙八歲登基，又由鰲拜攝政。至康熙親政之後，才結束長期的攝政期，而康熙雄才大略，為了鞏固基業，極積進取，平定三藩，收台灣入版圖，與沙俄訂約，更征討蒙古，將實力伸張到中亞，形成世界級的歐亞大帝國。

滿族入關建立大一統的帝國之後，漢族所居的中原成為其統治的中心，滿族素居的滿洲仍然是邊疆。滿族在入關之前皇太極天聰九年（1635）已使其「四境敵國」多納入統治，不僅漠南蒙古已經歸附，朝鮮也「稱弟納貢」²²。滿族入關之後，漠南蒙古併入版圖，「為旗五十有一，併同內八旗」²³，形同滿蒙一家。其餘邊疆國族於入關之前既已結盟並遣使通貢，入關之後則效前朝冊封之法，以達到羈縻的目的。順治元年（1644）多爾袞率清軍攻佔北京，即昭告諸藩，繼明朝為中國之共主；順治十年，更冊封達賴喇嘛²⁴，西藏也歸入版圖。

清帝國的版圖遠大於明帝國，長城防線已無必要，形同虛設，終成遺跡。然而蒙古仍有不服的部族，經過康熙到乾隆的長期征討，才得以徹底平定準噶爾。準噶爾原是漠西厄魯特蒙古之一部，居西北金山，當明朝衰亡之際，即試圖重振雄風，統合各自為政的部落，然至

²² 《清太宗實錄》，卷20.

²³ 嘉慶《大清一統志》卷534.

²⁴ 冊文見《清世祖實錄》，卷74.

崇禎十三年（1640）仍然是一鬆散的組合，一直要到十七世紀後半葉出了強橫的雄主噶爾丹（Galdan）才統合成功，以致於將準噶爾擴張成為中亞最大的政治實體²⁵。而此時正值沙俄東侵，滿州崛起，中國北疆又呈現新一輪的爭奪局面。

滿清與漠西蒙古早於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就有朝貢關係，相互親善²⁶，然噶爾丹起為領袖，曾到拉薩拜五世達賴為師，借宗教為其政治資本，以遂兼併西蒙古諸部，侵佔漠北喀爾喀蒙古之野心，而達賴亦稱噶爾丹為活佛，後又加封號，以籠絡為己用。噶爾丹遂向東擴張，入侵喀爾喀²⁷，迫使喀爾喀人南遷，造成大批難民，清廷將之安置於內蒙之北。噶爾丹擅稱汗號，兼併蒙部，自不能被清帝允許；不過，由於應付西南三藩之亂，以及阻止沙俄深入滿州，故直至康熙平定三藩，攻克台灣，訂立尼布楚條約之後，才能全心面對西北。康熙與沙俄簽訂條約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欲防止沙俄之支援噶爾丹²⁸。

康熙的蒙古政策最初僅欲各族和平相處，以便分而治之，更以朝貢貿易來滿足蒙族的物資需求，以資羈縻，與喀爾喀淵源尤深。喀爾喀原有七旗三汗，於滿清入關之前即已臣屬，建立了頗為穩固的宗藩關係²⁹。康熙元年（1662）清廷派遣理藩院尚書至庫倫會盟，宣達清廷諭旨，調解內部矛盾，諸汗一致遵從。此舉無疑加強了大清帝國在漠北蒙古的宗主地位。然而噶爾丹在中亞崛起之後，不聽清廷節制，又不斷向東掠奪侵吞，更欲藉西藏神權以及與俄國結盟，來鯨吞漠北

²⁵ 參閱Frederick Bergholz, *The Partition of Stepp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pp. 58-59.

²⁶ 參閱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頁2.

²⁷ 《準噶爾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頁90.

²⁸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to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07-09.

²⁹ 張穆，《蒙古游牧記》，（台北：蒙藏委員會，1981）頁127-131.

的喀爾喀蒙古³⁰，甚至煽動內蒙，並遣使傳豪語：「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³¹，顯然要挑戰中華帝國的宗主權，要與大清平分天下。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又乘虛入侵內蒙，劫掠殺戮。清廷聞報，即遣軍與喀爾喀兵戰，然戰事不利，更增其氣焰，乃乘勝南下，兵鋒距北京城僅僅700里，京師戒嚴³²。

連中華帝國的京師重地都受到威脅，清廷不得不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7月27日宣布御駕親征，兵分三路，動用大軍、火砲，鳥槍，意圖一舉而剷除噶爾丹的根本，以清掃沙漠。噶爾丹雖然受創，但得以逃脫。不過，康熙乘親征之便，親自與喀爾喀諸部會盟於多倫諾爾，使中國皇帝感到，有喀爾喀防備朔方，不再需要長城作為防禦設施³³。事實上，終清之世，已無如明朝一再修繕長城之必要。噶爾丹敗遁之後「乞和」，但不到兩年，故態復萌，甚而殺害清廷使臣，要求喀爾喀七族脫離大清。康熙不得不嚴加防備，並再度用兵；噶爾丹則採游擊式的騷擾戰，行蹤飄忽，難以追剿。康熙充分認識到噶爾丹對帝國的安全威脅，甚至認為「此人力強志大，必將窺伺中原，不至殞命不止」³⁴。御駕親征及其規模與耗資之巨，也足見邊境威脅帝國安全之嚴重性。

康熙以十倍之眾，絕對優勢的兵器，然由於距離綿長以及補給之困難，一旦噶爾丹逃奔，難以持續追逐，而噶爾丹自邊境逃脫之後，又可死灰復燃，捲土重來。故康熙班師回朝三個月後，再度親征；不過，此次展示軍威，以招撫為主，所謂「宣化地方行圍」³⁵。康熙的確

³⁰ 喀爾喀蒙古領地極為遼闊，東起黑龍江之呼倫貝爾，西到阿爾泰山，北接俄羅斯，南臨瀚海。

³¹ 語見《平定朔漠方略》，收入台灣商務版四庫全書，卷7,頁29.

³² 參閱《聖祖仁皇帝實錄》，台北華文書局版，卷146，頁18, 23,24.

³³ 同上，卷151,頁20.

³⁴ 語見《平定朔漠方略紀要》，頁1.

³⁵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76,頁4.

招撫了包括噶爾丹部眾在內的厄魯特蒙族，但要招降噶爾丹本人尚須動用武力，不僅調兵遣將，而且聯合西北歸附各族，設哨圍困。噶爾丹終於遣使納款，康熙也就傳令班師；然而噶爾丹卻未如期來降，於是康熙於三十一年（1692）二月三度親征寧夏，率師出塞。此戰迫使大批噶爾丹部眾歸服，青海諸部俱降，然噶爾丹雖然陷於困境，俄援不至³⁶，仍然拒降。康熙以為噶爾丹「或戮或擒」指日可待，遂於五月「凱旋」，於途中始得悉噶爾丹已死。征剿噶爾丹歷時凡七年，三度御駕親征，最後才迫使噶爾丹走向窮途末路而亡。此一勝利雖然代價極高，但終於使喀爾喀蒙古得還故土，並獲得沙漠南北、陝西、甘肅、青海、西藏等邊疆地區的長期安寧³⁷。康熙剿滅噶爾丹，平定漠西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更順服感恩，遂按內蒙四十九旗之例，擴大推行旗盟制度，以固全蒙古各族的政治統合。制度之外，清帝更以「木蘭秋獮」增進與蒙古各藩之間的感情，也就是每年秋天與蒙古王公們會獵於承德的木蘭圍場，建立親善關係，以藩部做為帝國的屏障。

康熙晚年，又進軍拉薩，進一步收服西藏。西藏的政權原在各寺廟的僧侶手中，而僧人有賴蒙古的支持。西蒙強人噶爾丹死後，其侄策妄阿喇布坦（Tsewang Rabdan）又將天山以北的準噶爾蒙部復興，並攻打哈密，侵佔拉薩，帝國的大西北與大西南又受到威脅。康熙尤忌西藏的達賴與準噶爾結成聯盟，遂又發動驅逐準噶爾保全西藏的戰爭。清軍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將阿喇布坦趕出哈密之後，駐守西寧。當準噶爾部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之秋，又入藏騷擾掠奪，並攻擊駐拉薩的七千清兵，擊斃清將鄂倫泰。康熙即命皇子胤禔率師入

³⁶ 尼布楚條約，很可能防阻了俄援蒙古；如果噶爾丹如願得到俄援，或又有起死回生的機會。噶爾丹在兩大之間，都不是盟友，最後敗亡自非偶然

³⁷ 參閱《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二集》，收入四庫全書，卷24,頁10-11.莊吉發譯注，《清代準噶爾史料初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頁219.袁森坡，《康雍乾經營與開發北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第三章。

藏。胤禔與年羹堯在西寧聚集三十萬眾，先頭部隊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月出發，九月佔領拉薩，立達賴七世，準噶爾蒙兵敗遁，康熙為了穩固對西藏的控制，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設立驛站，並留兵駐守。

康熙駕崩之前，清帝國的疆域已經基本確定，其在位期間與沙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國際條約，首次在人煙稀少、土地遼闊的中俄邊境上清清楚楚地畫出國界，邊境各類族群非中即俄，國家認同不再模糊³⁸。蒙、藏、台灣也均入中國版籍。康熙四十八年（1708）已開始繪製巨型地圖，經過全國性的大規模測量，由耶穌會士協助，利用近代製圖學，終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到康熙六十年（1721）之間繪成《皇輿全覽圖》。載明帝國的皇輿東起庫頁島，西至伊犁河（即東經27度到西經40度）；從西北的貝加爾湖到東南的台灣島（即北緯18度至61度），實際控制的領土範圍，較明帝國遠為遼闊³⁹。

當康熙駕崩之際，新一輪的準噶爾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繼任的雍正皇帝雖於用兵邊疆較為保守，然並未放棄徹底殲滅準噶爾的決心，據近人研究，終雍正之世征伐準噶爾所花銀子不下50,000,000-60,000,000兩，仍未盡全功⁴⁰。不過，準噶爾連年戰爭，經濟凋零，民生疾苦，於乾隆登基後，情願接受朝貢貿易交換所需物質，以換取和平。但是在乾隆十年（1745）阿喇布坦死後引發準噶爾內亂，導致清

³⁸ 康熙親征噶爾丹經過之詳情可參閱Perdue, *China Marches to West*, chapter 5.

³⁹ 此銅版圖發現於瀋陽故宮，後由金梁印出並為之序。近人研究可參閱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地學雜誌》（1930）18卷3期。Peter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XX, 2 (June, 1998), pp. 253-504. 孫靺，《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96-139。

⁴⁰ 葉之儒，〈從貿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對準噶爾部的民族政策〉，《新疆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頁63。

廷派將軍兆惠遠征，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徹底覆亡。清軍殲滅準噶爾之後，更深入天山南麓的綠洲，置土耳其斯坦大部分綠洲的居民於大清控制之下，建立屯墾區。打勝仗的清軍將士兵員實由多種民族組成，包括滿族、漢族、蒙族、甚至投降的準噶爾人。他們合力保住了中國的土耳其斯坦，最後建省新疆。新疆與、內外蒙古的廣大領土盡在大清帝國的掌控之下⁴¹。

乾隆皇帝遂命臣工親自勘測天山南北路，編成《西域圖誌》，確定新疆的範圍及其與俄羅斯等鄰國的分界。乾隆十五年（1750）進軍西藏時，亦曾實地勘查繪圖，分為前、中、後三藏，統治更加穩固。最後繪成規模更大的《內府輿圖》，補充了康熙朝的《皇輿全覽圖》。如地質學家翁文灝所說，中國在十八世紀早於歐洲各國，先完成了全國性的總圖⁴²。不過，製圖雖然先進，代表主權的國界觀念仍未成熟；除了與俄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確定國界外，其餘仍然延襲傳統的朝貢關係，視為疆域內的藩屬。

滿清以雄騎征服神州大陸後，像前朝一樣面臨東南海疆的控馭問題。東南海疆自從十六世紀五十年代的倭寇之亂後，就沒有完全平息過。所謂倭寇並非全是日本人，大多數還是中國人，由於海上貿易受到多方限制，海商往往挺而走險，成為海寇。所謂倭寇之亂後，海上走私與搶掠自浙江海岸移向福建海岸。據徐仲楫萬曆四十三年（1615）的報告，動亂已遍及福建全省⁴³。帝國政府認為由海盜造成的閩海安全問題，十分嚴重，然而海盜行蹤飄忽不定，猶如秋風落葉之難掃。

閩海鄰近的澎湖早已歸入帝國版圖，台灣島雖久為華人所知，仍

⁴¹ 參閱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158。

⁴² 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頁

⁴³ 《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1971），160。

孤懸域外⁴⁴。華人由於好奇觀覽，或徵用島上土著的勞力，不時來訪，然鮮見移民。直到十六世紀，明將俞大猷追擊海寇林道乾，殘眾遂據至台島為生，並以台灣為基地繼續騷擾福建沿海⁴⁵。十七世紀之初，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先後來到中國的南疆海域。荷蘭人於十六世紀獨立之後，尤致力於工商與航海貿易，並建立了盈利豐厚的國際貿易⁴⁶。成立於萬曆三十年（1602）三月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一個武裝貿易集團，以巴達維亞（Batavia）為基地，東經中南半島，南海，台澎，直達日本。荷人於1601年以及1603年兩度叩關粵海，要求互市遭拒，並受到澳門葡萄牙人的排斥⁴⁷。但荷人無意退出南海商機，並力圖將貿易進入中國大陸。荷蘭人先欲佔領澎湖為基地⁴⁸，在明將沈有容的威脅下退出，轉進南台灣的大員。明廷對於澎湖的安全非常關注，堅拒荷蘭佔用，也拒絕貿易的要求⁴⁹。幾經商議之後，福建官員願見荷人佔用大員，然而貿易許可遲遲不發⁵⁰。荷人遂以騷擾中國沿海為報復，攔截自錦州至馬尼拉與菲律賓之間的船隊，此後中荷之間衝突不斷。

荷人無法以澎湖為基地展開與中國的貿易，遂經營台灣，除婦孺之外，擁有「二萬五千壯健人口」⁵¹，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南亞與日本之間的轉運港。不過，荷蘭與明清帝國政府間的通商談判，久無成

⁴⁴ 連橫《台灣通史》，（1962）冊1頁1-2。華人早於西元前涉足台島的紀錄可見范曄，《後漢書》，卷10，頁2822。

⁴⁵ 《明史》，（1974），卷18，頁5433, 5601-5608。

⁴⁶ Jonathan Israel, 1998:117, 308-09, 319-20.

⁴⁷ Wang Linheng 1969: juan 3.

⁴⁸ W. P. Groeneveldt, *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Eerste Deel*, (The Hague, 1898), pp.11-23; 《明季荷蘭人侵據澎湖殘檔》，頁1-10..

⁴⁹ 《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1971,頁96; 參閱Chang T'ien-tse,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Leyden: E. J. Brill, 1933, 1969), pp. 113-117

⁵⁰ 閱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24,28-29

⁵¹ Inez de Beauclair, *Neglected Formosa*,1975, 14.

效，轉而與民間華人進行貿易⁵²。荷蘭人也歡迎福建人到台灣提供勞力並作為對華貿易的媒介，亦因而使中國官方擔心本國人與外國人之間有所勾結而滋禍⁵³。與外國勢力勾結而雄視海疆者，莫如鄭芝龍，鄭曾隨荷蘭人入台，並受雇於荷蘭東印度公司⁵⁴。鄭芝龍乘機在北港壯大，引進更多的福建同鄉，成為亦商亦盜的集團⁵⁵。鄭氏集團的崛起及其堅船利砲使兩廣總督感到束手無策⁵⁶，亦令荷人敬畏⁵⁷。明朝屢戰不勝，沿海安全可慮，而北方又有滿州的威脅，不得已而招撫芝龍⁵⁸。鄭芝龍憑其實力，於崇禎元年（1628）受招之後，不僅保存實力，而且成為穩定南疆軍政的要員。此後，鄭氏以閩南安海為基地，更加擴大商業網絡，特別是對日貿易，利潤亟豐；惟因重心移轉福建，遂令荷人獨占南台灣，然仍與鄭氏保持貿易關係⁵⁹。

鄭氏勢力轉移到福建之後，多少影響到鄭氏海上王國的建立，鄭芝龍不僅在閩購置田產，而且捲入大陸政治，最後投降滿清，但其子鄭成功堅持效忠明室，據海抗衡，復攻克荷據台灣，其子鄭經繼續以台灣為根據地對抗大陸，並參與三藩之亂。清帝康熙痛定思痛之餘，決心收復台灣，卒賴施琅之力，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灣。翌年在台灣設立一府三縣，即台灣府，台灣縣，諸羅縣，鳳山縣，由知縣治理，並駐軍八千，分為水陸八營，由總兵官統帶，澎湖另設副

⁵² 參閱日本歷史學者岩生成一的論文〈近世日支貿易の關係數量の考察〉，《史學雜誌》，62, 11; 981-1020.

⁵³ 見《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1971, 頁128-131.

⁵⁴ 廖漢臣，〈鄭芝龍考〉，《台灣文獻》，11, 3 (1960年9月), 頁3.

⁵⁵ 毛一波，《古今台灣文獻考》，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70, 頁88。

⁵⁶ 《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1971, 頁147, 158.

⁵⁷ *De VOC en Formosa*, 84; Boxer 1941, 421

⁵⁸ 《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1971, 頁147.

⁵⁹ Wills 1974, 24-25

將一員，統兵兩千⁶⁰。台澎歸入大清帝國版圖之後，海禁遂開；雖然防備仍嚴，海外貿易畢竟不可阻擋，尤其在廣東、福建沿海一帶富商巨賈遠航重洋，「挾奇贏興販四方」⁶¹。

就大清帝國的空間而言，其疆域面積之遼闊，從中亞西亞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南海，雄據亞洲大陸，形成一個龐大而統一的政治實體。大一統的明清帝國承襲了傳統中國的天朝體制，以中原與江南為經濟與文化的精華區，而以廣大的邊境為藩屬，作為屏障，總面積超過4,000,000平方英里。

空間的景觀

清帝國的疆域大為開拓，唯所開拓的領土大都地處邊荒，其精華地區仍然是十八行省，沿前明舊規而繼續發展。此十八行省就是所謂「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江河東流，貫通東西，大運河則南北向，連接南北，中有秦嶺，略分南北。漢唐帝國的兩京長安與洛陽，位於關中，地處本部之西北。明清帝國之兩京，南京與北京，則位於本部之東。京師首都之東移，並非如明人于慎行所謂關中之興衰「亦由氣數變遷使然，豈盡人事哉」⁶²。緣漢唐之後，關中由盛而衰並不是神秘的氣數使然，自有人事因素在焉，更由於關中的地理條件已不敷帝國京師之需，自然環境與經濟發展的趨勢逐漸向東移動。

英國史家湯恩比則以「壓力挑激」(the stimulus of pressure)之說

⁶⁰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15，頁4。另參閱王之春，《清朝柔遠紀》，（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36。Young-tsu Wong, "Security and Warfare on the China Coast: The Taiwan Ques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onumenta Serica, 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No. 35 (Fall, 1983), pp. 111-196.

⁶¹ 語見《澄海縣志》序，轉引自王冠倬《中國古船圖錄》頁265。

⁶² 于慎行《讀史漫錄十四卷》萬曆刻本，卷2頁16。

來解釋中國政治權力中心的位置及其移動。他認為邊陲地區較有能力適應外在的壓力，故立足於邊陲的政權才足以駕馭內地。周都渭水之濱、秦都汾河之濱，均承受高原蠻族的壓力，若外在壓力導致邊陲政權覆亡，始移向內地。湯氏據此解釋他所謂的「華夏文明」時代之都城，不時在長安與洛陽兩京之間遷移。及至他所謂中國進入「遠東文明時代」，因高原蠻族在華夏文明晚期的「危機時代」已被征服，新興的壓力來自北方的「亞歐游牧民族」(Eurasian nomades)，故都城也就向北邊傾斜，並在壓力下自唐至宋逐步東移，宋朝在遼金壓力下復向南方移動。他再以此理論解釋明太祖雖建都南京，而永樂仍必須北遷，以北邊東陲的北京為都城，以便面對北方的壓力；不過，他又說朱明定都北京僅僅暫緩「危機」，仍無可避免滿清入關，並在中國建立統一的帝國⁶³。其實，無論長安或北京均非邊陲政權，而是中原政權的中樞，尤其在明清時代的北京，不是消極地承受壓力，而是積極地解除壓力。滿清雖是邊陲民族，然入主中國之後並非建立邊陲政權，而是取代朱明政權。明清代興的「危機」屬於明室，而非中國⁶⁴。

在明清時期，經濟與文化的重鎮已移至江南。江南於明代正統六年（1441）以金陵為陪都，設立十四府、四州、十三屬州、九十六縣。清初以長江中下游以及淮海地區與贛江流域為江南省。就自然環境而言，江南東臨大海，南據太湖，西接楚梁，北向淮甸。江南由於土地肥沃，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經過自東晉南朝到南宋以來的經營，已是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所謂「以東南之形勝，而能與天下相權衡者，江南而已」⁶⁵。

明朝發跡於江南，定都金陵，使此一六朝古都首次成為全國首

⁶³ A.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vol. 2, pp. 120, 121, 122.

⁶⁴ 批評湯氏邊陲控御內陸理論詳閱汪榮祖《史學九章》（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⁶⁵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台北新興書局，1956）冊4頁841。

都。清代江南之繁榮已遠遠超過黃河流域，政治中心雖在北京，經濟與文化重鎮仍在江南，大運河成為漕運的通途，以濟京師以及華北物質之需。明清帝國的政治中心都在北京，而經濟重鎮多在江南。元代已依賴江南漕運，所以大事整修大運河，自北京直通杭州。所謂京杭大運河，全線超過1,700公里。元末改由海運，大運河漸廢棄不用。明永樂帝遷都北京後，漕運又為國家急務，遂於九年（1411）開通會通河，又開通惠河，以擴充水源，至永樂十三年（1415）運河再通。至嘉靖六年（1527），漕船可直達京師大通橋。萬曆、天啟年間繼續疏浚與開通，「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⁶⁶。到了清康熙年間，京杭大運河，經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溝通南北五大水系，全長1,900公里，成為連結南北難以取代的大動脈與生命線⁶⁷。南京位於長江下游，明初建都南京不僅僅是因為傳說中的王氣，最主要的還是戰略地位與財富所在。南京城原來只有35英尺寬，25英尺高⁶⁸，內城或稱子城，原是南唐皇宮以及南宋行宮之所在。根據美軍於1945年高空照測，城牆約有23.2英里長，比北京城還長2.2英哩，城牆平均高度約12米，城牆頂部由石板鋪道，寬7米，13,661個垛口，200座藏兵窩鋪，顯然是一龐大的建築工程⁶⁹。

南京古稱金陵，群山環繞，玄武、莫愁兩湖輝映其間，秦淮河環城而流，與太湖水系縱橫相連，形成披山帶河的雄偉景觀。在漢朝時已經是一個政治中心，三國東吳的建康城即建於此，後來成為南朝八國的都城，乃是雄視長江下游的政軍要地。長江自南京城西南向東北流去，東見高聳的鍾山，南望雨花臺，西瞰五臺山。明太祖於登基前

⁶⁶ 《明史》卷85。

⁶⁷ 參閱鄧逸麟編著《中國歷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343-345。《清代京杭運河全圖》（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4）。

⁶⁸ 柳詒徵等編，《首都志》，（南京：正中書局，1935），頁71-73。

⁶⁹ 參閱F.W.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 136.

已開始在南唐江寧府城的基礎上興修城牆、廟宇等設施，並增建大內宮城，初具都城規模。定都南京後，更擴建城內建築，諸如鐘樓、鼓樓，城門、廊房、酒樓、廬舍等，又於城外建刑部等官署⁷⁰。經過大約三十年的經營，於洪武二十七年（1394）南京已成為規模宏大的京師，城牆依山帶水，分為京城、外城、宮城、皇城、四大部分。

京城攬入南唐舊都的大部分，向東擴大到紫金山的西麓，北至玄武湖之濱，將雞鳴與覆舟兩山納入城內。又於城外修建外廓，周長大約64餘公里，包攬郊外山川，以天然土坡為郭，有十六座城門，略呈圓形⁷¹。明南京城由於大事擴建，因而成為很不規則的形狀，建成中國歷史上最曲折、最長、最寬、最堅固的城牆，故有「龍蟠虎踞」的形勝⁷²。新建之明大內宮城居皇城之中心，又稱紫禁城，東南西北四方，各有三門。宮城兩側分別為東安門與西安門，大殿之前有奉天門，大殿之後接著是華蓋殿、謹身殿與乾清宮。城門之外，護城河、跨橋、一應齊全。包含宮城的明皇城，位於京城之東，原是燕雀湖的舊址，因填湖而成⁷³，故南高北低，位於鍾山之陽，略呈方形，二重六門，左右對稱，甚是整齊。皇城的長安右門外通長安街，可直達市區大中橋。皇城有四門，並有開闊的御道連結城南的正陽門向北到洪武門，再進入午門，也就是皇城的正南門，太廟在左，社稷壇在右。北門稱玄武門，西有西華門，東有東華門；皇城的洪武門之東有長安左門，其南依次建有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的衙門；長安

⁷⁰ 參閱《明太祖實錄》卷100頁4；卷115頁4；卷130頁1；卷145頁2；卷201頁1-2；卷217頁4。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圖書集成本）卷13頁3。《金陵通紀》卷10頁3-5，

⁷¹ 參閱朱傑《金陵古蹟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7，193。

⁷² 參閱徐泓〈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食貨月刊》復刊卷10期3（1980年6月）頁83-84對南京地理環境有精要的描述。另閱王會昌《中國文化地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頁149-183。

⁷³ 見嘉慶《一統誌》卷73-74「江寧府」條。

右門之南依次為中軍都督府、次左軍都督府、軍都督府、前軍都督府、後軍都督府、最後是太常寺，所以所有的重要官署都設在御道之旁，路的兩側有遮蔭避雨的走道以便官員之用，唯有刑部與刑場設在皇城的北門之外，以示肅殺之氣。新建寬廣的國子監則在城北，明朝開國的第二年就已經建成，收藏了宋元以來大量木刻書版，並於此編成《永樂大典》，印刷各類書籍，曾有中外學子數千名在此就讀⁷⁴。眾多的其他官署則散落在城內各個角落，官署的建築面積都很大，有的還有庭園。不論那一類建築都講究佈局，配合四周山川景色。繁多的官署，數以百計的新街，好幾十個市場、公園、遊樂場、官府與私人宅第，以及軍營、工廠與倉庫。當時城內的居民享有開闊的空間、每一戶幾乎都有高頂的正廳，大都是平房，都有些院子⁷⁵。

市街位於南京城中部和西南部，秦淮河從城東南的上方門流入市區，逐漸成為繁榮的商業區，交通方便，店鋪沿街而設，織造業尤其興隆。擴大後的明南京城需要從浙江與南直隸移入大量人口，來到以後分派到坊、廂與鄉。城區內有坊，按職業劃分，如織錦坊、工匠坊、鐵作坊等等。城外郊區曰鄉，郊外的原居民區曰廂。明初南京人口增加快速，從洪武四年（1371）的186,259人，增加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的233,906人，到晚明約增至330,000人，若加上駐軍，總人數可達550,000人，尚不包括無法估計的工商業流動戶口⁷⁶。如此規

⁷⁴ 參閱陳昌遠，《中國歷史地理簡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頁481,477-480。

⁷⁵ 參閱《白下瑣言》（光緒十六年刻本）卷1。

⁷⁶ 此人口數字根據徐泓的估算，見氏撰〈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頁101, 102, 103。根據1931年的戶口統計，南京地區永久居民達500,000人，分住在24坊，24鄉，39廂之中，若加上200,000駐軍，則總數是700,000，參閱陳昌遠，《中國歷史地理簡編》，頁136,139,141,142，144。馬正林編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226。牟復禮認為明開國前南京人口大約只有十萬，建都之後在二十年內增長了十倍，所建官署須容納10,000個文官，12,000個武官，將近50,000名下層官吏，擁有8,000到9,000名學生的國子監，以及200,000的駐軍。參閱F.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p.132, 136.

劃，使明代開國時新建的南京城，成為名副其實的壯麗京師。

明初定都南京也帶動整個江南地區城市的發展，新增城市甚多，在河道縱橫的平原上，市鎮形成網狀結構⁷⁷，周邊山區也得到開發，人口也增加得很快⁷⁸。趙岡認為，明清時代在江南興起了「新類型市鎮」，其新在於「不是為農村消費服務，而是為農村生產服務」⁷⁹。生產服務主要是收購農村副產品，大都是手工業產品，以棉紡織手工業與平織絲綢為主。新型市鎮自然具有生產與市場的商業化功能，將江南所生產的絲綢與棉花轉往全國市場。

明初以南京為京師，六十六年之後，於永樂十九年（1421）正式遷都北京，但南京仍然保持特殊地位，號稱南都。北京建都，始於遼朝，金承遼都，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改稱大都⁸⁰，成為蒙元帝國的政治中心。明將徐達攻佔大都後，略加修建⁸¹，改大都為北平府，具有平定北方的意思。明成祖朱棣將京師從南京搬到北京，將政治中心北移，不僅是因為其根基所在，更重要的是因為整個帝國的安全威脅來自北方。北京城大規模的營建始於永樂四年（1406），至永樂十八年（1420）才初步完成，正式改稱北京。

明代的北京城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加以改造擴建而成。城市被城牆圍繞，多少會限制城市的發展，遲早將無法阻止向城外郊區擴張。北京城南由於大運河導致商業興隆，人口密集，至明中葉由於蒙古的威脅而有擴建外城之議，直到十六世紀的六十年代才築成包容南郊一面

⁷⁷ 參閱樊樹志〈明清長江三角洲的市鎮網絡〉載《復旦學報》2（1987）頁93。

⁷⁸ 參閱Sen-Dou Chang,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53, No. 2 (June 1963), p. 136.

⁷⁹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193。

⁸⁰ 參閱陳宗蕃編著《燕都叢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頁10-14。

⁸¹ 徐達築城的年代考證可參閱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營建叢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18。此書對官書所載徐達增築北垣，永樂拓展南城，嘉靖建外城多有考訂。

的外城，又稱南城，所加築的外城，在平面圖上呈現「凸」字型狀，一條十八里的子午線，自永定門，經內城、皇城、宮城，貫穿南北。原有的土城牆逐步用磚包砌，城內設三十六坊，內城二十九坊，外城七坊，並開挖護城河，環繞外城，從東便門流入通惠河。

北京左海右山，南河北漠，長城依燕山蜿蜒西去，氣勢宏偉，原是古代燕國的首都，秦始皇毀之。永樂營建北京城的規劃與南京略同，分紫禁城即宮城、皇城、內城、外城，以及元大都舊城。整個北京城佔地約25平方英里，或60.06千米，呈平行四邊形，有城牆與護城河圍繞。正方形的內城，東西長6.65千米，南北寬5.35千米，坐落在東西長7.95千米，南北寬3.1千米的長方形外城之上。外城在南，城牆約40呎高，基層62呎厚，高層34呎厚。內城在北，呈方形，城牆有30呎高，基層厚25呎，城牆周長23.72公里。整個城牆有十六個城門，外城門九個，內城門七個，每一座城門有三層樓高的綠色琉璃瓦城樓。內城最重要的前門，位於正中向南，明永樂帝所建，名之曰「正陽門」，當時有正陽外門等四個門，外門唯當皇帝欲往天壇祭拜時才開，內外門之間另有城閘⁸²。

內城的中心是皇城，皇城之中有宮城，亦稱紫禁城，周長六里，南北長960米，東西寬753米，呈矩形，面積0.72平方千米，共有八門，建於元大內遺址而稍向南移，有城牆與護城河環繞，城牆高9.9米⁸³。紫禁城北門與南京一樣亦稱玄武門，至清帝乾隆始改稱神武門，出門面對煤山，清初改稱景山。南門叫承天門，清初改稱天安門，門前有T字形廣場，沿廣場東西南三面修建宮牆，納廣場於內，東西兩翼各開一門，即長安左右門，正南是大明門，清朝改稱大清門，向北直

⁸² 有關北京城的簡介參閱L.C. 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Peking, Henri Vetch, 1934), pp. 1-4.

⁸³ 參閱《明史》卷40地理誌。張先得編《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1-3。並參閱頁1地圖。

達承天門。乾隆皇帝曾延伸天安門前宮廷廣場的東西兩翼，增築宮牆，納入長安左右門外大街的一部分，增設新門，加強廣場的隱密性⁸⁴。此外，在西郊廣築園林，最有名的就是圓明園。

紫禁城內宮闕的設計，也以南京為藍圖而增其規模，嚴整其佈局。宮城牆外兩側佈置官署，東文西武，一如南京的規劃。宮城東有東華門、西有西華門、北有玄武門（康熙諱改神武門）、南有承天門、端門、午門。承天門由黃色琉璃瓦覆蓋，城台四周有漢白玉欄杆，城下有河，架有七橋，橋前有石獅與華表。午門有正樓與兩座側閣，正門由皇帝出入，官員則由側門出入。由午門入奉天門，後改稱皇極門，清代改稱太和門，為三大殿之前導，廣場開朗，金水河上架有虹橋，橋側有雕欄，紅牆金瓦、藍天綠水、白藍灰地，呈現五彩繽紛的景觀⁸⁵。

宮城外朝三大殿，奉天、華蓋、謹身，以文華殿與武英殿為兩翼，面積85,000平方公尺，甚是壯麗，於元大內遺址上建成，曾屢次重修。清初改稱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太和殿寬63.96米，進深37.17米，高26.92米，為全國面積最大、氣象最宏偉的的宮殿建築。三大殿之後為內廷後三殿的乾清宮（皇帝寢宮）、交泰殿、坤寧宮，以東西六宮（嬪妃宮室）為兩翼，奠基於元大明宮遺址之上。六大殿以外的次要宮殿，分布於東西兩側的廊廡之外而相互對稱，殿宇的開間以九間為最尊貴，清朝增至十一開間，以示主次與級別。宮城周長3,428公尺，四隅各設角樓，周圍有御河，寬52米，清朝改稱筒子河⁸⁶，河岸秀麗。興建御河時挖出的黃土堆成49公尺高的煤山，清朝改稱景山，乾隆時於景山五峰各建一亭。宮後的御苑長90公尺，寬140公

⁸⁴ 張先得編《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門》，頁193。

⁸⁵ 參閱Arlington and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pp. 25-61。

⁸⁶ 參閱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34。嘉慶《一統誌》卷2。

尺，苑內建有欽安殿，圍牆環繞，自成院落，殿後亭閣對峙，遠攬西山景色。以宮城為中心，四周佈置太廟、社稷、天壇、地壇、日壇、月壇、祖社、四壇等祭壇廟宇，極為對稱，呈現帝國威權與神權的搭配⁸⁷。

明代北京皇城周長約11公里，呈不規則方形，北垣長約2,460米，西垣約2,644米，東垣約2,150米，南垣約1,770米，牆呈紅色。皇城開六門：正南有大明門，清代改大清門，其東有長安左右門，其西有西安門，其北有北安門，清代改地安門。承天門，清代改稱天安門，面對御道，兩邊有千步廊，展現開闊的廣場。永樂十五年（1417）拓寬南垣，形成西南角的缺角。皇城牆高6米，牆內建築多係苑囿、官署、庫藏之屬，清代設三院七司，仍是政府機構的集中地，三海景山均在皇城之內⁸⁸。皇城南端的橫街，貫通東、西城，又稱棋盤街，乃商賈百貨雲集之地。越棋盤街而至內城的正陽門，南向大道直達外城的永定門。從清初重建的鼓樓與鐘樓經景山中鋒，越紫禁城的中心點到永定門，形成一條全長八公里的中軸線，前朝後廷六大宮殿整整齊齊位於此中軸線的正中，城垣與城門均衡對稱，氣魄宏偉，象徵帝國的政治中心，足見設計者突顯皇權威儀的用心⁸⁹。

內城於明遷都北京後二十五年已經相當完備，牆高12公尺，周長23.3公里，四周城垣內側各建有登城馬道，東垣長5,330米，設兩門，東直門居北，朝陽門居南，運河漕運至此，內設糧倉；西垣長4,910米，北為奚植門；南為阜成門，外通煤礦，煤車多由此出入；北垣長6,790米，安定門在東，軍隊回師經此；德勝門在西，軍隊出征經此；南垣長6,690米，正陽門（今之前門）居中，官員多由此出入；崇文門

⁸⁷ 參閱Arlington and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pp.62-76

⁸⁸ 參閱張先得編《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門》頁14-19。

⁸⁹ 參閱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186-197。

在東，設有稅關，商人多由此出入；宣武門在西，設有會館，士人多由此出入⁹⁰。明正統四年（1440）內城完成九門城樓，九門之外建有牌樓與角樓，牆外有河有橋，橋下建閘，各設三重水關。

北京外城在內城之南，嘉靖二十九年（1550）因蒙古威脅而增建周長14.41公里，其南城稍凹，東城稍凸，西城略高，有護城河，共開七門。南垣長7,854.20米，永定門居中，左安門在東，右安門在西；東垣長2,800米，開廣渠門；西垣2,750米，開廣寧門；北垣開東西兩便門；四周都有箭樓⁹¹。地標有建於永樂年間的天壇，佔地六十餘英畝；得名於元代的琉璃廠，成為明清以來的著名文化街；還有源自唐朝的法源寺，以及景色宜人的陶然亭。明初在城西建「廊房」作為商業區⁹²，隨經濟發展而日趨繁華，內外城街道佈局以通往城門的道路最寬，不是東西向，就是南北向。城門與城門之間的主要街道與次要街道之間形成網狀般狹巷，其中散佈着大部分居民居住的胡同，計有四百五十餘條之多，寬者約4米，窄者僅70釐米，僅可通人，絕大多數集中於正陽門內與皇城兩邊的中城地區。胡同裡的住宅都是平房，即四合院，每宅有單獨的院落與庭園。平民所居之處俗稱「豬圈」，取自明末俗語：「圈在豬不在，圈在豬還來」，隱藏復興朱明的意思。大街之上，則聳立了不少表揚功臣烈婦的牌樓，呈弧狀，居民因而以牌樓命名附近的地區，如東單牌樓、西四牌樓等等。民居仍以坊為單位，坊之下有鋪。全城及郊區有33坊，705鋪⁹³。清朝入關仍以北京為都城，坊鋪街巷胡同雖有變遷，但基本上承襲明代規模，無大改變。

西華門西邊的西苑，為明清皇帝遊樂之地，建有亭殿樓閣與太液池，又稱三海，即北海與中南海，海中有瀛臺，建有昭和殿，環顧四

⁹⁰ 參閱張先得編《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門》頁28-32。

⁹¹ 張先得編《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門》頁130-131。

⁹² 參閱劉德岑《古都篇》（西南師大出版社，1986）頁257。

⁹³ 見沈榜《宛署雜記》。

周景色。清帝更在西郊建三山五園，即萬壽山、玉泉山、香山；圓明園、靜明園、靜宜園、暢春園、清漪園。圓明園甚是壯麗，是滿清帝國所創造最宏偉的帝王御園，擇地於玉泉山，山腳下的平原有豐沛活水，位於今日北京之海淀區。來自玉泉的水既清涼又乾淨，有云：「明月夜映清光圓」，故喻為「月光下的珍珠」⁹⁴。豐沛的泉水由於海淀和鄰近地區有充足的地下水，「淀」的原意就是匯聚水的地方。整個園址的地形，足以使一座壯觀的宮苑發揮其極致的美學效果。現代中國著名建築師梁思成曾說：圓明園是聚山丘湖泊，結合殿堂、亭台樓閣和其他建築結構的設計精華。在設計上，全園雖注重對稱與平衡，然亦依照地形來強調變化，以及以活潑的造型來發揮別樹一幟的風格。梁氏慧眼雖認為圓明園過度人工雕琢以致於破壞了美麗的形勝，但他畢竟肯定具有生命力的圓明園，富有創意⁹⁵。

圓明園在廣大湖區和高聳的西山之麓所呈現出來巧奪天工的布局，被稱之為「萬園之園」⁹⁶。由於周遭環境非常之好，早在十三世紀元朝的時候就已經建有優美的莊園。到了十六世紀，天然美景吸引了明代的武清侯李偉的靈感，在此建造了十分著名的清華園，被喻為「京國第一名園」。此後又有名書法家米萬鐘，也在此建造同負盛名的勺園，取「海淀一勺」之意。根據北京大學侯仁之的說法，這兩座享有盛譽的園林於明清易代之際遭遇到破壞與荒廢⁹⁷。清代的統治者在海淀區新建了更多的宮苑。根據三張可用的地圖顯示，圓明園裡的巨大湖泊是由運河網絡和蜿蜒的水道所連接起來的。從鳥瞰的角度來看，所有在圓明園內的建築都坐落在小島之上，由假山、台榭、花石、樹叢和灌木圍成個個單獨區域。那些被特別命名的「景」點，則

⁹⁴ 閱《北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頁297。

⁹⁵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5）冊3，頁227-231。

⁹⁶ Chen Chongzhou, *On Chinese Gardens*,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

⁹⁷ 侯仁之〈圓明園〉載《圓明滄桑》（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頁99。

由一組組既獨立又聚在一起的小庭園所構成。當時親眼見到這座巨大園林的英國人，觀察到每一個個別景點都是「包含了一大群各式各樣優雅精緻的小建築」⁹⁸。乾隆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1737年，他傳旨宮廷御用畫家將圓明園的景觀恭繪在絹本上。完成後，就掛在清輝閣的北壁之上。清輝閣位於「九州清宴」裏皇帝寢宮的西側，建築樣式呈單純的長方形，配上工匠在樑柱上雕刻精緻的圖形和裝潢，使閣的景緻和其他周圍的建築配合在一起，在感官上十分宜人。清輝閣有一個非常顯著的懸挑設計，懸挑有塗漆保護，不易腐朽，讓閣裡的人不受天候的影響。清輝閣的直角和軸心對稱又顯示莊嚴，皇帝和他的侍臣們常來此作詩、繪畫和欣賞風景，以暢雅興⁹⁹。圓明園內四十景於乾隆九年（1744）完成，其中十二景是乾隆於登基之後才興建完成。溫文儒雅的乾隆皇帝為四十景中的每一個景，都題上講究的名稱，並附題詠詩一首，後來輯成《圓明園四十景圖詠》。乾隆皇帝像一飽學之士為他的宮苑景點取了優雅的名字和具有詩意的主題，以呈現獨創的景物形象，並由一位精挑細選出來的學者書寫，以整齊劃一。這位皇帝還授命宮廷御用畫家沈源和唐岱，以及書法家汪由敦繪製兩冊長2.6英尺和2.35英尺寬的絹本彩繪，以呈顯出所有四十景的圖像¹⁰⁰。法國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神父於四十景完成後就來到圓明園，親眼看到在一片大地上，20至60英尺高的山丘上，有非常多既雅緻又可愛的房舍，自然而然形成許多「村落」。這些村落在王致誠的筆下應該就是

⁹⁸ Samuel H. Holmes, *The Journal of Mr. Samuel H. Holmes*, (London: W. Bulmer & Co. 1798), p. 134.

⁹⁹ 參閱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冊2，頁1333-1334。

¹⁰⁰ 見《圓明滄桑》頁16。這套畫作和詩集被法國人在一八六〇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掠走，隨後被

發現收藏在法國巴黎的國家圖書館裡。法國在一九八三年給中方贈送一套原圖彩色照片的底片。

至於由孫祐和沈源簽章的同一個絹本彩繪的木刻版，則早在1920年代就印製出版了。參閱程漢生《圓明園考》（上海：中華書局，1928）頁1。

那些被命名的景點。他還看到許多「清溪」流向或大或小的湖泊裡，並且在運河當中有一艘「78英尺長、24英尺寬、載有華麗樓座」的壯觀大船，以及「不同的殿堂、開放和密集的門廊、花園、園林和瀑布，當統觀這一切時，頗有賞心悅目的效果」。他估計組成四十景的建築群超過兩百幢，如此雅緻的地方他不曾在歐洲見過，認為圓明園是「真正的人間天堂」¹⁰¹。

包括京城在內的傳統中國大地上，城牆是特殊景觀，起源甚早，目的為了安全，以利防禦以及維持秩序。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有城隍廟，則是祈盼神明保佑。城牆圍繞之處多半是政治中心，如京師、府城、縣治，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都市文明，已有幾千年的歷史，至清代縣城約有1,500座¹⁰²。一般只有一道城牆，但大城或要鎮如北京、南京、濟南、蘭州、廣州除了外城還有內城。牆外有護城河，大致而言，北方的護城河較窄而南方較寬，如北京的只有30米寬，而南京的卻寬達80米；之所以如此，因為南方之水多於北方之故。護城河至城門處較寬，並有跨河之石橋或木橋。城牆大多築於平地，即使在山多的福建，亦復如此，似與便於農作有關。城牆的材料大都就地取材，長江流域與珠江三角洲多用泥磚，長江上游則用石磚。高築城牆的目的，不外是保護宮殿、衙門、糧倉、廟宇、民居，以及抵抗外敵。位於牆角的城關木製有瓦，高約三層塔，為護城兵卒起息之所。城牆作為防禦設施，在火砲發明之前，相當有效，即其高度可達15米，就不容易攀登。

江南地區的核心名城蘇州，在宋代時已有「蘇常熟，天下足」之

¹⁰¹ Jean Denis Attiret,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g*, transl. from Frech by Sir Harry Beaumont (Joseph Spence), (London: Garland reprint, 1982), pp.7-8.

¹⁰² 《清史稿》卷61。

稱¹⁰³，在明清時代更成為繁榮的絲綢織城市，號稱是「江南才賦之淵藪」¹⁰⁴。美軍於1945年所攝高空鳥瞰圖裏的蘇州城牆、城門、城濠、與1229年所繪的宋平江圖¹⁰⁵相比，雖屢經重修，但城市的空間與基本型態未變，最明顯的改變只是子城的消失。牟復禮教授認為，蘇州此一大型城市在716年之間，持續不斷地興隆而維持基本形貌，在其他文明中找不到同樣的例子¹⁰⁶。明清時代蘇州的空間確實仍然是平江圖裏的格局，同時也可見此城在這一地區，經過好幾千年的轉變，從未間斷地在時空裏持續發展，而其重要性也未曾稍減。人稱蘇州是東方的威尼斯，然而馬可波羅所見的蘇州，認為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十四世紀之初的蘇州，在規模上顯然要比當時的威尼斯大出三倍¹⁰⁷。蘇州佔盡天時地利，亦因而頗享人和。溫和的氣候有利於農產，便捷的水道四通八達，大運河經此可通長江。蘇州不僅本身繁榮，同時帶動附近的城鎮，諸如吳江、崑山、長熟、無錫在十六世紀的晚明都已經有100,000人口之眾。蘇州的財富不是投資在土地上，就是投資在園林上，因而明清時代的蘇州園林，已是舉國無雙，明代計有271處，清代計有130，最有名的有拙政園、留園、網師園等等，所謂「江南園林甲天下，蘇州園林甲江南」，其中頗多私家花園，乾隆皇帝擴建圓明園尚需到蘇州來借景。

今日依舊聳立在蘇州市區的北寺塔，高250英尺，歷盡滄桑，閱盡變故，無疑是蘇州最矚目的地標。此塔初建於西元第六世紀，只有七層；倒塌後，至第十一世紀的宋代才擴大改建，到十二世紀的三十年

¹⁰³ 見陸游〈奔牛水閘記〉

¹⁰⁴ 明代學者邱濬語，見邱濬《大學衍義補》卷24。

¹⁰⁵ 此圖高八尺，寬3.5尺，甚是精細，宋代蘇州的城市面貌，包括街道、流水、建築物等，一覽無遺。此圖有拓片。

¹⁰⁶ Fw. 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in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Vol. 59, No. 4 (Fall, 1973), pp. 38-39.

¹⁰⁷ 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p. 43.

代，金人入侵，塔與廟俱毀；二、三十年後又大事重建，塔高增加到九層，平江圖所見已是今日北寺塔的母型。不過，明初又經重修，十六世紀七十年代遭遇火災後，於萬曆十年（1582）到十八年（1590）之間徹底重建，臻於宏偉。萬曆三十一年（1603）整修，康熙九年（1670）大修，至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大亂，又遭摧毀，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才重新修復。北寺塔雖非明清時代的原塔，其意義是象徵歷史時空的延續，不因人事的滄桑而中斷¹⁰⁸。

蘇州的城牆約長13到14英里之間，大概築於七世紀到九世紀之間。五代後梁龍德二年（922）時擴建，加固並完成25英尺高與同樣尺碼的基層厚度。平江圖之後，城牆時毀時建，但並未影響街道、運河、橋樑、以及主要廟宇與官署的格局。整個城區約12.5平方英里，足以容納250,000到500,000的居民，而所有的住屋都是平房。根據此一人口與居住面積，則每一平方哩約有40,000人，或每700平方呎一人。若除去百分之二十九的街道、公共設施，以及富戶豪宅，每人仍有500平方呎，或五口之家仍有2,500平方呎的空間，可允許佔地1,500平方呎的平房加上1,000平方呎的院落與活動空間¹⁰⁹。

明太祖開國之前，在平吳戰爭中，嚴重破壞了蘇州古城。戰後重修的蘇州府城周長約17,100米，呈長方形，一如平江成，南北12里，東西9里；城高7.8米，女牆高2米，基闊11.3米。城門有六，一沿宋元舊制，其中五門皆有水門，各門皆有城樓，城內外都鑿有數丈寬的長濠，建有吊橋，以便進出。元末吳王張士誠曾焚毀子城，明初建府於蘇州，即以子城遺址興建府署，由於「興既滅之王基」的流言，犯了明太祖的大忌，子城亦就棄置不用。明代蘇州府全城大小街巷三百餘條，前街後河，主河道有三橫四直，小河道則不下百餘條，伸展四

¹⁰⁸ 參閱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p.50.

¹⁰⁹ 參閱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pp.53, 64.

方。大小河道加起來約有5,000多米長，一派水城風貌。由於明代工商業的發達，街巷兩旁出現了工作坊、店舖、會館，闔門外的南濠街更成為繁華的商業區，全城亦因而變得熱鬧，即明人唐伯虎詩句所謂：「市河到處堪搖擗，街巷通宵不絕人」。明清兩代的蘇州都稱府，為巡撫與布政司的官署所在地。清初經過戰亂後，修整城垣，江蘇巡撫韓世琦於康熙元年（1662）改建蘇州，恢復到宋元時期周長25,900米的規模，城牆高約9.3米，寬6米，女牆約2米的規模，水陸門依舊，增建了瓮城，即內外城之間的20平方米空間，以便誘敵深入，得到瓮中捉鱉的效果。水門成為溝通大運河的孔道。清代蘇州不僅是江南的政治中心，也是經濟重鎮，並逐漸向城外發展¹¹⁰。

江北名城揚州南臨長江，北接淮河，西有運河，東至於海，也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古城，然其區劃到隋代開通大運河後始趨穩定，仍沿用古稱廣陵或江都。揚州的城郭，「其形似鶴」¹¹¹，府城垣周長2,280丈，呈長方形，水道陸路交通方便，衙門公署位於西北，學校與文化設施置於西南，武備與市場店舖散佈於東北或東南¹¹²。揚州於明初因元末大亂，一片殘破景象，雖略有整修，其範圍僅是宋城西南一角；至萬曆年間，由於商業之發達，形成繁榮的商業區，成為新城，以別於舊城¹¹³。新舊城於明清時代各司其職，官府、縣學、第宅都在舊城，而新城一直是商人與商業的集中地。新城東北的便益門有渡頭，遊船聚集於此，右岸有都天廟，由廟前磚路可抵達位於廣儲門的漁市，下通天寧門，亦有遊船，左岸有梅花書院與史可法墓。萬曆二十年（1592）太守吳秀開濬積土，種植梅花，稱梅花嶺，嶺上有平山別

¹¹⁰ 參閱宋如林等修撰《蘇州府志》（1824）。李銘皖修撰《蘇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2）。《姑蘇繁華圖》。

¹¹¹ 李斗《揚州畫舫錄》（揚州：江蘇廣陵出版社，1984）頁139。

¹¹² 參閱余棣元明〈揚州城的歷史變遷〉載馮爾康編《揚州研究》（台北1996）頁118-120。

¹¹³ 此節敘述參閱〈揚州府新築外城記〉載《揚州府志》（1733）卷5頁3-4。

墅，兩側有州縣會館，嶺下有寬敞的廣儲倉，清雍正時興建。自明朝以來，揚州郡城頗多書院，多由官員興建，然位於北橋、建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敬亭書院，則為兩淮鹽商所首創¹¹⁴。

天寧門位於新城西北，街口原是天寧寺山門舊址，原有高二十丈的牌樓，故俗稱牌樓口。位於牌樓口的天福居有花市，揚州花市頗多，因揚州人不論貴賤，都喜歡戴花。天寧寺位居揚州八大刹之首，清康熙帝曾賜四匾，供奉於大殿。康熙與乾隆兩帝曾多次下揚州，天寧寺為四大行宮之一，寺右建有大宮門、二宮門、前殿、寢殿、戲臺、御花園、護衛房等設施。御花園正殿大觀堂之旁有御書樓，賜名文匯閣，藏有四庫全書與圖書集成。城北之上下買賣街，除肆市外建有土地廟、城皇行宮等建築¹¹⁵。

舊城正南是安江門，即南門，城外有子城，子城內有關帝廟。歙縣汪氏於城南古渡橋旁建南園別墅，有「深柳讀書堂」、「穀雨軒」、「風漪閣」等勝景。從南門到北門一共三里半路，自南門大街經院大街到北門大街。西門又稱通泗門，頭釣橋與二釣橋分跨子城內外的市河，二釣橋下有畫舫碼頭，過橋陸路兩支，分別可通廿四橋¹¹⁶與雙橋。從西門大街到大東門大街，共一里半路。從大東門城腳到小東門城腳，共有九條巷。小東門街有許多食堂。從小東門大街行三里路抵達缺口門，可通往專賣緞子的多子街¹¹⁷。

揚州北郊的虹橋是有名的風景點，主景原稱紅橋，因橋之紅欄而得名，後來改建為石橋，朱欄如彩虹臥波，故改稱虹橋。四周荷香柳色處處，兩岸房舍雕龍畫棟，綿延十餘里。當春夏之交，氣候宜人，

¹¹⁴ 李斗《揚州畫舫錄》頁56，58，60。

¹¹⁵ 李斗《揚州畫舫錄》頁77，78，82，98，99，131。

¹¹⁶ 廿四橋非因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而得名，實有二十四橋，沈存中於《補筆談》中一一列舉，見李斗《揚州畫舫錄》頁324。

¹¹⁷ 參閱李斗《揚州畫舫錄》頁156，157，159，176，179，180，181，182，185，188。

遊人泛舟湖上，畫舫絃管繁急，掩映出沒其間。四時花卉叢開，春天為梅花與桃花，夏天為牡丹、芍藥與荷花，秋天為桂花與芙蓉。當鮮花盛開之際，遊人如熾，船價也增加數倍。虹橋碼頭稱虹橋爪，為一條長堤的起端，逶迤到司徒廟的上山路而止。堤上有「長堤春柳」等五景以及清初興建的韓醉白別墅。虹橋的東岸有名重一時的江園，乾隆賜名「淨香園」，園內有竹徑，臨水築有曲尺洞房，有額曰「銀塘春曉」。水上有許多白鵝，水邊有茶肆曰「江園水亭」。園中勺泉，味極甘冽。虹橋名列揚州名園之一，成為士大夫文酒聚會之地，增添湖山之勝的人文風味¹¹⁸。

揚州地處南北要衝，固然導致商業發達、富裕興隆，然亦因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時而毀於砲火¹¹⁹。明末清軍入關，導致名聞史冊的「揚州十日」屠城，慘不忍聞¹²⁰。清初重建蕪城，在維持原有格局的原則下恢復與擴建。康熙平定三藩之後，局勢穩定，淮揚一帶始因鹽致富，揚州成為鹽商之家。到乾隆時代，腰纏萬貫的鹽商，憑其財力，大事營建，使新城的聲色光彩顯著超越舊城，也造成揚州於十八世紀的空前繁榮。

在華北與華東的平坦地區，城牆大致呈方形或長方形；方形城牆多見之於華北與西北，如華北的山西大同府，長方形如西北的西安與太原¹²¹。不規則城牆則以華中與華東為多，杭州城就有最著名的不規則城牆。杭州與蘇州並稱蘇杭，位於錢塘江畔，古稱錢塘，隋代始稱杭州。錢鏐所建之吳越國即都於此，南宋也建都於此，改稱臨安，曾

¹¹⁸ 參閱李斗《揚州畫舫錄》頁230-231，240，250，256，261，283。

¹¹⁹ 此論見梅爾清《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10-11。

¹²⁰ 王秀楚《揚州十日記》目擊屠城，記之甚詳。英譯見Lucien Mao, "A Memoir of the Ten Days' Massacre at Yangchow," *Tien-hsia Monthly* vol. 4, no. 5 (May 1937), pp. 515-537.

¹²¹ Sen-Dou Chang, "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 in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75-100.

大事營建，除了在鳳凰山方圓九華里內興修宮殿之外，將羅城擴大，其範圍東臨錢塘，南越吳山，西接西湖，北至武林，氣勢宏偉。

華南的主要城市如南昌、貴陽、桂林、廣州、福州的城牆都非方形或長方形。基本上呈圓形的城牆多見之於中部與南部的邊遠地區，如明太祖的故鄉鳳陽也是圓牆¹²²。此外，還有橄欖形、蛋形、圓寶石形，如寧波、無錫等地。有少數城市為了風水的原因，如泉州府，刻意作鯉魚跳躍龍門狀。在丘陵地帶為了將有限的平地劃入城內，形狀不得不隨地形而變，像甘肅靈臺縣城即呈葫蘆狀¹²³。由於供水的需要，城市多般位於河邊；運河沿岸以及從漢水到揚子江合流處，都是城鎮聚集之地。在缺水的大西北，年雨量不到十吋，居落只能出現在少數的綠洲之上，如甘肅走廊上的城市幾乎都位於扇形沖積地上，依靠每年春天來自附近高山的雪水。長江中游的武昌城西北臨江，城門甚少，顯然基於防洪的考慮。明朝開國後所修建的武昌城，西北城垣高出東南八尺之多。漢口只有西北城垣以防漢水氾濫，東南無牆因已有防洪堤防。漢陽東南臨江，故東南城垣高出數尺¹²⁴。武漢三鎮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為了預防洪水不斷的侵蝕，不斷加高臨江的城垣，呈現特殊景觀。

作為皇城多般是全國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如唐之長安、北宋之開封、南宋之杭州、元之大都、明之南京、清之北京。在中原十八省中的十四省中，省城往往是全省最大之城。在帝國時代，城市中有二個以上隔離城牆者，並不少見，如在城裡或城外建專為滿族居住的城，猶如雙子城。滿清在華北與西北至少建有三十四個此類滿族城。另外一種雙子城或三子城則由於河流的關係，如府城重慶位於嘉陵江

¹²² Chang, "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 p.89.

¹²³ 參閱馬正林編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114-149。

¹²⁴ 馬正林編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頁79-80。

與長江交匯處，與嘉陵江北岸的廳城江北，遙遙相望；武漢三鎮隔江相望，更是最好的例子。還有一種新舊雙子城，舊城因天災人禍被毀，遂在旁另建新城，然有時舊城仍有人居住，形成新舊並存的現象，如直隸順德府的密雲與廣東的南雄，就是很好的例子。

明清時期徽州的民居，四周也圍有高牆，另有防火牆。白色高牆除開大門外，尚有水磨磚或黑青石砌成的不同形狀窗口。高牆呈階梯狀，牆頭或有捲草、如意等圖案。大門講究氣派，正門兩旁有邊門，並建有門樓與門罩，拾石級登門。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明清建築群，位於徽州黟縣的宏村，整體按牛形佈局，數百棟老宅鱗次栉比而建形像一頭大水牛，一條石砌水渠引山溪進村，蜿蜒穿庭入院，猶如牛腸，注水入月塘，塘形似牛胃，溪水在流入村前南湖，有若牛肚。觀此可以想見，宏村宛如一頭巨無霸水牛，悠閒地斜躺於明清時代的青山與綠水之間¹²⁵。

徽州與蘇州同屬江南，明代同屬南直隸，清初同屬江南省，至康熙六年（1667）始劃入新建的安徽省¹²⁶。徽州位於江南秀麗富饒的丘陵地上，市鎮沿江河而設，新安江及其支流沿岸尤呈線狀分佈。今之皖南贛東地區，仍然保存了大片明清古建築群，展現明代疏朗淡雅的韻味以及清代細緻精美的風格。安徽屯溪仍可見一條1,200米長的明清時期商業老街，具有明清風格的大批民居，則起伏於山腰與山麓之間。村落隨地形而建，或依山傍水，或背山面田，河流山溪潺潺。村鎮裏有百年老宅、石路、古樹、綠水、古橋、方亭、古塔，布置於山光水色與碧綠的田野之間。錯落的青瓦白牆明清建築群，尤令人注目，可以想見明清時代這一帶具有活力與美感的風貌¹²⁷。

¹²⁵ 圖片可閱陳從周、潘洪萱、路秉傑著，金寶源等攝影，《中國民居》，（台北：南天書局，1993），47,48.本節所述明清民居除1996年訪覽外，亦多參考此書。

¹²⁶ 見《嘉慶重修一統志》卷112。

¹²⁷ 本文作者祖籍徽州之旌德，1986年初次訪問故里，在黟縣逗留數日所見。

中國傳統建築喜歡坐北朝南，但在黟縣的明清民居卻並非如此，或坐西朝東，或坐南朝北，絕無面向正南的房屋，原因不是地形而是風水，以為夥人發祥的龍脈起於西北，若大門朝南，則犯相剋脈，再則夥人多經商，明清的徽幫早已名聞於世，相信「商家門不宜南向，征家門不宜北向」的說法。風水迷信也是一種人文，這種人文也對明清時代的物質景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明清徽州民居頗多大宅，以三合院或四合院為多，最大的有一百多個門庭。主房旁邊有偏房跨院，呈方形；屋多兩層，磚木結構，前庭有天井。樓下有門廳、客廳、臥室、廂房等，樓上則有民間所設祭祖座位，臥室在兩側，裝潢採「跑馬樓」式，柱子外側周圍裝有鏤雕木欄杆。凡徽派民居都講究裝飾，諸如門樓的磚上有石雕，窗扇、欄杆、月樑上有木雕、天井石欄上有鏤雕，另有彩畫，甚是奪目¹²⁸。

明清帝國景觀的大要，已如上述；以下將敘述龐大的明清帝國空間是如何聯繫的。在現代交通網出現之前，驛傳使遼闊的疆域四通八達。

空間的聯繫

明清承襲蒙元帝國，蒙元的疆域空前遼闊，不得不廣設驛站，以為聯繫¹²⁹。終元之世，交通網絡北達黑龍江與葉尼塞河，西至西藏，驛站以大都（北京）為中心，幅射1,500餘處。明朝開國之君朱元璋就已認識到驛傳的重要性，認為「驛傳所以待命而達四方之政，故雖殊方絕域不可無也」¹³⁰。他以南京為驛傳中心，除恢復前元驛路外，隨

¹²⁸ 有關徽州地區的概述可參閱唐力行《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16-19。

¹²⁹ 不過，驛遞制度可追溯到周代，唐代以後漸趨完備，參閱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台北中華叢書，1969）頁1-3。

¹³⁰ 見《洪武實錄》卷166。

着軍事行動的開展而建設新驛站，如於征討雲南之前，在岳州到貴州之間，設驛25站，以便傳遞軍情與輸送糧草，形成雲貴驛傳體系，由湖廣經貴州，入滇東，而達昆明。明朝統一後在北疆所設的九邊之間，亦設置驛所，互通消息。洪武帝在遼東設置21驛，永樂帝又增設45驛。宣德帝整頓西域21驛，由於廣設驛站，使明廷中樞能將聯繫伸展到西藏等邊遠地區¹³¹。除北方沿邊之外，明廷通往浙東沿海的衛所以及偏遠地區，不斷增設新驛，以通驛路。如洪武十九年（1386）在奉化縣設立西店驛，翌年又於寧海縣設立桑洲驛。成化六年（1470）於福建漳州府南靖縣設平南驛，汀州府上杭縣設平西驛。萬曆元年（1573）於四川巴中設新驛等等¹³²。衛所由於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有權直接起關驛馬、驛船，以便飛報軍情。

大致而言，明清驛傳在元代的基礎上加以完善，驛傳系統以京師為中心而遍佈全國各地，驛傳機構則可分為「遞送使客，飛報軍務，轉運軍需等物」¹³³的「驛站」¹³⁴、運送物資與使客的「遞運所」、以及專司遞送公文的「急遞舖」三類¹³⁵，沿途設置驛、驛館、台、站，等中間站作為傳遞的主幹，其功能費用均由中央報銷。「驛站」任務最多，幾成為驛遞機構的統稱。「遞運所」有水陸之分，水遞備有馬船與紅船，陸遞責備有大車，以運貨為主，明中葉以後漸由「驛站」取代。明代「急遞舖」十里一舖，舖兵一晝夜行30舖，約300里，萬曆初由於冗濫而功用不彰，郵傳任務亦由「驛站」承受¹³⁶。從唐宋到蒙

¹³¹ 洪武初年即已通西藏，五年烏斯葬入貢，參閱《明史西域列傳三》。

¹³² 詳閱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頁19，21。

¹³³ 見《洪武實錄》卷25。洪武二十七年完成《寰宇通衢書》，為全國水馬驛程的紀錄，雖已失傳，但為同類書之先驅。

¹³⁴ 驛字說文段注謂「傳車」與「傳騎」，元代稱站，明改站為驛，但一般仍通稱為驛站，驛站有水陸之分。參閱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頁6-9。

¹³⁵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2。

¹³⁶ 參閱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頁6-10。

元，為接待官員而建的驛館往往寬敞豪華，而明清驛舍已漸趨樸實¹³⁷，可見其主要功能由接待官員而轉向文書之傳遞與物質之運輸，講求實用。

明代驛傳由兵部總其職：設置驛站、發放符牌、制訂規章等等。各地方則由布政使與安察使管理驛傳道，總理一省驛政。驛站可分水陸兩種，水驛用船遞，陸驛用馬或車遞。各驛站有驛丞，總領一驛事務，「典郵傳迎送之事」¹³⁸。無論乘驛或遞報須有牌符，以資證明；牌符制度在宋代已經嚴格執行，明代有符驗、堪合、火牌三種牌符，牌符上註明數量，以防作弊或勒索。

日常文書則由「急遞鋪」傳送，擔任傳送任務的鋪兵，大都由貧戶或「漏籍戶」充當¹³⁹。每鋪設鋪司一名，登錄收到文件的狀況與時間後，由鋪兵轉撥到下一個鋪，有如接力賽跑，一晝夜可行400里。明代物質轉運由設於交通樞紐的「遞運所」承擔，解運勞力則由官方囚徒提供。由於水運價格較廉，「遞運所」擁有為數不少的船隻與水夫；然而因為開銷很大而經費短缺，至萬曆年間已經裁撤大半¹⁴⁰。

明代驛路的分佈，明顯配合主要的交通路線。永樂以後，南北兩京並重，從北京到南京的驛路，至為重要。這條路線從京師城內的會同館出發¹⁴¹，南下130里至涿州（今河北涿縣），再南下250里至河間府（今河北河間縣），再南下260里至德州（今山東德州市），於此渡

¹³⁷ 此乃顧炎武所見，見《日知錄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443。

¹³⁸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7）職官誌。

¹³⁹ 劉廣生、趙梅莊編《中國古代郵驛史》（北京：郵電出版社，1999）頁389引《永樂大典》文。

¹⁴⁰ 參閱劉文鵬《清代亦傳及其與疆域形成關係之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33-36。

¹⁴¹ 會同館明成祖永樂六年（1408）設置，正統間擴建，分為南北兩館。南館在玉河西堤，北館在澄清坊大街之東，兩館舊址均在今之北京市，永樂舊址則為燕臺驛。閱楊正泰《明代驛站考》頁8。

衛河，行150里至高唐州（今山東高唐縣），行70里後轉往西行70里，至東昌府（今山東聊城縣），再南行160里至兗州府（今山東兗州縣），再南行395里達徐州（今江蘇徐州市），再南行165里至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再西行至汴城（今河南開封市）而後南下205里至鳳陽府（今安徽鳳陽縣），再東南行165里至滁州（今安徽滁州市），續行95里至江浦（今江蘇江浦縣），到達長江北岸，渡江南行15里，抵應天府（今江蘇南京市），全程一共2,130里¹⁴²。這條路線繼續南行可達浙江與福建。另自京師經江西到廣東，經河南到湖廣與廣西，經陝西至四川，經貴州至雲南¹⁴³。另外，從兩京到各布政司都有驛路可通，各布政司至所屬府州也有驛路可通，形成綿密的網絡。以訊息傳遞與聯繫管道而言，明清規模已遠遠超過漢唐。

驛站的物質供給，在元明時代，即由官府指派百姓提供，列入專戶，世代相傳，不准改業，以求穩定。所提供的服務不外是提供飲食、交通工具，以及各類差役。至於在交通網絡上由軍士負責的軍堡，則以運輸物質為主。就全國而言，驛遞實在是一項龐大的運作工程，尤賴官府的妥善經營；到了晚明，政情衰蔽，奸吏、驛棍叢生，上訛官府，下索民間。民間益貧，依靠驛傳系統維生者日多；一旦明廷不堪荷負，不得不裁減驛站時，大批失業的驛夫遂成亂源¹⁴⁴。

滿清建國之後，其控御的疆域既大於明朝，驛傳的範圍也就更加遼闊，對驛傳也極為重視。康熙帝即靠驛傳「飛馳告變」，才得知吳三桂在雲南叛變，明白傳遞軍情的重要性。施琅之平定台灣以及林爽文亂事之平定，所謂「紅旗報捷」，也是靠「飛折八百里驛遞」。所以清廷除了承襲前明的驛傳系統外，且在關外廣設驛站，使東北與漠

¹⁴² 參閱（明）黃汴《天下水陸路程》楊正泰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1-3。《中國歷史的圖集》（中華地圖學社出版，1975）冊7頁40-44。

¹⁴³ 參閱黃汴《天下水陸路程》頁16-38。

¹⁴⁴ 參閱彭孫貽《平寇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1。

北驛道相連¹⁴⁵。康熙與乾隆兩帝為了平定準葛爾，更設直通往新疆的驛站不下百餘所，事後也加強了與內地的聯繫。雍正帝於1734年建設「塘訊」，除了傳送文書外，以聯絡聲氣為重，增添了郵驛的實質意義¹⁴⁶。這種郵驛即使在蒙古的草原大漠雖自成體系，卻亦與整個清帝國的龐大郵驛網絡連成一體¹⁴⁷。當帝國尚未完全穩定之前，僅致力於中原十八省驛傳系統的改善，及康熙平定三藩與討伐喀爾丹戰爭的勝利，更將驛傳系統擴展到大西北與大西南邊疆。此後，驛與遞合而為一；驛站已兼具多種功能，連軍堡也附屬於驛站，歸驛丞管理。

大清帝國所形成的訊息網絡以北京為中心，一線經通州，越山海關，沿遼西走廊，直抵奉天（今之瀋陽），再北可達吉林、齊齊哈爾、以及黑龍江畔的愛暉；二線經內蒙南通朝鮮、北達俄邊；三線自涿州由東南向經河間入山東德州，一路縱貫山東全省，另一路經宿遷入江蘇省，沿高郵南下渡江而至蘇州，再自蘇州南達杭州，再自杭州經蘭溪南下建陽，直抵福州，再自福州西向經上杭入廣東潮州；四線自江蘇銅山至鳳陽，一路由鳳陽達江寧，另一路由鳳陽經合肥至桐城，一路由桐城到安慶，另一路由桐城西入江西，以達南昌，向南入廣東，東南入福建；五線自北京經保定、大名入河南安陽，一自安陽西通開封，另自安陽南下新鄭，由新鄭經信陽抵武昌南入長沙，再自長沙一路通廣東，另一路經衡陽入廣西桂林，南通越南，西通雲南；六線自新鄭經襄陽入湖南，經桃源、芷江入貴州而達雲南；七線自北京西南向由正定西通太原，南抵潼關、西安，自西安南經咸陽入川，再經棉州抵達成都，再由成都西通西藏，另自西安通蘭州，再自蘭州經張掖進入新疆；八線由北京西北，一路至張家口，北經內蒙可通新

¹⁴⁵ 西清《黑龍江外記》。

¹⁴⁶ 《清史稿傅青傳》。

¹⁴⁷ 《清史稿兵制八》。

疆，另一路經長城以南抵嘉裕關，與蘭州驛站相接，亦可通新疆¹⁴⁸。

大清帝國經由驛傳系統所要傳遞的主要文書有廷寄、題本、奏折。廷寄始於康熙，成於雍正，乃皇帝經由軍機大臣發佈的旨意，多半是軍政要務，所以既不抄發也不交部議，而是加封後直接交兵部，發給驛傳馳遞。乾隆十七年（1752）之後，廷寄由軍機處直接封發，不再經過兵部¹⁴⁹。馳遞的速度由軍機處在廷寄的封套上註明，大致按政情或軍情的重要性，分為300里、400里、500里、600里四種¹⁵⁰。最緊要的廷寄必須「隨到隨發」¹⁵¹。最快的600里加急，從北京到新疆的伊犁，若日馳600里，12,000餘里的路程，須時二十日。在這二十天日夜急速的接力賽跑中，真不知要銷耗多少人力、馬力、物力，可見傳遞一份緊急廷寄的代價之高。

題本在明朝就有，乃官員向朝廷奏報軍政事務的文書。來自京內外的題本，須經通政史司先檢查是否合乎規定，然後呈交內閣；內閣稟擬意見後，再上呈皇帝御批。在軍機處成立之前，軍政要務莫不經由題本處理，故傳遞題本在時效上也有嚴格的規定，大致視官員所在地與京城的距離而定，如近在保定的直隸總督必須於三日內遞到，遠在廣州的兩廣總督則可於二十四日內遞到。嚴格規定傳遞的時日，顯然在要求軍政事務不容壅滯，如有延誤與散失，必將受到懲處¹⁵²。

奏折最初僅是康熙親信大臣為了向皇帝請安之用；之後，地方大員除了請安之外，兼報地方政務，皇帝亦樂於從奏折中探悉地方政情，於是奏折日益推廣，至雍正成為定制。不過，奏折大都由驛遞，而由提呈奏折者自遞。奏折顯然只是個人意見，故不能用成本昂

148 參閱光緒朝《清會典事例》卷696。

149 參閱光緒朝《清會典事例》卷700。

150 據趙翼《簞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一。

151 光緒朝《清會典事例》卷702。

152 光緒朝《清會典事例》卷700。

貴的驛傳，假公濟私¹⁵³。至於有關地方緊要事務之奏折，匯齊後由專差一併遞送。事實上，從雍正到乾隆奏折的數量不斷上升，重要性不斷增加，逐漸成為正式公文，然而皇帝仍然堅持不准由驛站遞送，以免煩擾¹⁵⁴。

清代省以下之府、廳、州、縣各級地方政府之間，也設有上萬處的「急遞鋪」，除偏遠地區外，大約每十至二十里設一鋪，鋪司一名，登記文書，由四名鋪兵負責將文書傳遞到下一個鋪。自成網絡，專為接遞日常公文之需，沒有接待官員與運輸物質的任務。鋪之外，尚有「塘」；「軍塘」原是清廷在西北用兵時，傳遞軍營文報之需所設，「營塘」則係省級提督或總兵接遞軍營文報所需而設。所謂「提塘」，乃督撫駐京的單位，負責抄錄邸報或部文而後傳回本省，以通消息。清代的兩江總督就在總督府所在地江寧與北京之間設立塘撥達六十九處之多，以便將消息火速飛傳。驛站以及鋪與塘形成全國性的信息傳遞系統，為大一統帝國的政治控制不可或缺的一個機制。

清朝康熙、乾隆兩帝曾多次出巡，北出塞外，南巡曲阜、江南，東巡盛京。康熙與乾隆的南巡，規模尤大，內廷，皇族，親信，官員，軍隊隨行，象徵皇權的遠播，體會親眼目睹帝國實況的感受，以及察看帝政落實的情況。其他諸帝出巡的規模雖不能與康、乾相比，至少每年都要前往承德避暑山莊。皇帝出巡，政治中心隨之移動，隨時需要與全國各地互通訊息。於出巡期間，在京師與行在之間設有塘站，遞送文報的馬匹由在地督撫的驛站調度，並由兵部派筆帖式在東華門等候，隨時應差，而且每十日向皇上行在會報塘站運作情況，題本於出巡期間每三日一遞，乾隆改為隔日郵遞，隨時批發；奏折則隨

¹⁵³ 參閱Silas H.L. Wu, *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the 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1693-173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pp.

¹⁵⁴ 見《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頁1770。《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冊10頁755。光緒朝《清會典事例》卷696。

題本進呈，批示後送返京城，再交專差送回給督撫，所以即使皇帝出巡在外，仍然批閱公文奏折，全國軍政情況都在掌握之中¹⁵⁵。

從上述可知，明清的驛傳系統，以政府之力建立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其軍事與政治的目的彰明昭著，目的無非在掌控龐大的帝國，作有效的管理。驛傳的便捷，原也可以成為帝國的經濟動脈；事實上，明中葉以後，確有商人賣通驛丞使客，利用驛站與轉輸的方便，販運商品¹⁵⁶。然而畢竟是賄賂公所的非法行徑，無法成為正常的商品流通渠道，帶動整體的經濟發展。

結語

中原是明清帝國的根本，根本一失，帝國崩潰。然欲保住根本，必須穩固廣大的邊緣地區。換言之，邊緣地帶是帝國的保護帶，稱之為藩，視為屏障。清帝國設立理藩院，專門處理邊陲地區少數民族事宜，當其盛世，朝鮮、安南、緬甸都是藩邦，捍衛帝國的安全。明清統治者的帝國安全觀顯然受到地理環境與歷史經驗的影響。

根據考古學家與文化人類學家的研究，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國疆域內可能已有九千年之久的民族與文化交融史，隨著時間的發展，各民族及其文化之間的不斷互動與吸納，益見明朗，終於形成今日中國境內的五十六個民族，合稱中華民族。早在春秋時代，在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出現了經過融合境內異族的華夏民族，或稱諸夏。被視為蠻夷的西秦最後還統一了中國，成為一個政治性的諸夏集團。所以公元前221年已經呈現中國本部在政治上的大一統與文化上的大融合，把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合為一體了。代表南方的楚文化也終於與北方文

¹⁵⁵ 參閱光緒朝《清會典事例》卷702。

¹⁵⁶ 蕭端蒙〈議處驛站六事疏〉收入《明經世文編》，卷285。

化融合，「成為水平比它們更高、範圍比它們更廣的漢文化了」¹⁵⁷。這也就是費孝通所謂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¹⁵⁸。不過，在交融的過程中，中原與邊疆之間仍然時有對峙，以及不斷地衝突與戰爭。

當秦漢帝國在中國本部成立之初，北方邊疆已經出現另一以匈奴為主的民族集團。雖然據司馬遷說，匈奴也是夏后氏的苗裔¹⁵⁹，原非外族，但雙方武裝衝突，極其嚴峻，秦始皇不惜人力財力，興建萬里長城，並派蒙恬大軍駐守防禦。秦末大亂，匈奴乘機又進入河套以南。長城雖然主要是農業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分界線¹⁶⁰，但同時無疑也是一道防禦措施。漢帝國成立時，匈奴又已佔據冀北、陝西、山西等長城以南土地，足以分庭抗禮。漢高祖劉邦被匈奴圍困於平城，幸而脫困之後，改採和親政策，開放關市。於是漢、匈兩族在中國境內，「彼此在原來生活的地區分疆自守」¹⁶¹，但問題並未解決，至漢武帝國力充實，才有能力穩固帝國的安全，北服匈奴、東定朝鮮、南平百越、西通西域。

長城南北二個族群的對峙，於漢帝國崩解前後，掀起另一波的衝突與戰爭，所謂五胡亂華，造成中國在政治上的大分裂。至楊隋建國，境內的民族雖然逐漸融合，下開隋唐盛世，但來自北方邊疆的威脅，並未消除，唐太宗還曾稱臣於突厥。此後，宋有遼、金、蒙古之患，而蒙元與滿清先後以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權，統治整個中國。

¹⁵⁷ 張正明《楚文化史》，周谷城編，中國文化史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320。

¹⁵⁸ 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頁4；另參閱Ho Ping-ti, *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1—68.

¹⁵⁹ 司馬遷，《史記》中華標點本，（北京，1975），3：2879。

¹⁶⁰ 參閱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51, chapter 4.

¹⁶¹ 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人民出版社，1979），頁54。

從二千餘年的中華帝國史看，統治者的安全佈局大都放在綿長的北方邊疆，即使在秦漢或隋唐盛世，國力強盛，亦不例外，實因整個自然環境所使然，入侵者在遼闊的北疆，處處可以突破，防不勝防，所以秦以武力統一六國之後，仍須修築長城以自衛，是最好的指標，千餘年後明朝又重修長城，設立九邊，防守的態勢，依然未變，形成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謂的「長城心態」（Great Wall Mentality）。然而這種心態的始因，並不是費氏所意指的中國民族的保守性格，而是受制於自然條件，無可改變的宿命，不得不設置內線防禦，有如歐戰時法國的馬其諾防線，以策安全。當有餘力時再出兵塞外，以冀消滅潛在的敵人，如漢武帝之北伐匈奴，而類此主動攻擊，十足的「防禦性攻擊」（preemptive strikes）。明成祖遷都北京後也曾九入沙漠，以穩固長城一線的寧靜。有明一代亡於遼邊不守，事更顯然。

滿清自關外入主中原，不僅以中國自稱，而且承襲中華帝國傳統，建立本部的十八省，以儒教立國。滿人以少數民族繼中華正統，雖提倡滿蒙一家，以為奧援，但建政以後，仍一如前朝之以北疆蒙古為假想敵，非誠心順服，不足以言穩定。故康熙傾力征討準格爾，務使其順服而後已，進兵新疆以及西藏亦與蒙古勢力有關。清帝國之武力西進，領土雖持續擴張，但其目的也是「防禦性攻擊」，並不似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之奪取資源或殖民，而是建立屏藩，以策帝國之安全。及清之盛世，朝鮮、緬甸、安南、琉球皆為藩邦，形成一個以朝貢為扭帶的天朝體制，而此體制的維持，乃整個帝國安全的保證。當西方勢力洶湧而至，衝擊天朝體制，以致於危亡無日。